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李义芳. 古代沙市便河开凿与市镇形成[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4(1): 59-64.

古代沙市便河开凿与市镇形成

李义芳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直到上世纪60年代,沙市还有一条俗称便河的人工运河可以通航,南接长江,北通汉水,东达汉口。便河的开凿始于魏晋时期,杜预开凿杨水运河时,在离江陵城东不远处,利用三湖、荒谷水,使运河与长江水相通。这条以荒谷水为主体的南北向河流,便是沙市便河的最早起源。五代时,南平国高氏父子在修建江陵砖城,开凿护城河的同时,也开凿了从城东门至沙市的运河。此河东南流向沙市城,在金龙寺和塔儿桥附近与南北向的古运河相汇合,在沙市津巷口附近入江。随着运河的开凿和长江河道南移,作为荆州外港的沙市港,在唐宋时期沿江堤逐渐形成比较繁华的市镇。

关键词:古代沙市;便河;市镇形成

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1)01-0059-06

古代沙市有一条直通荆州护城河和草市河的运河,俗称便河(或龙门河、沙市河)。这条运河南接长江,北通汉水,东达汉口,在历史上是一条重要的漕运航道,是漕河的一条分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沙市城市建设的需要逐渐被填埋、阻断。这条历史上重要的航道,始凿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学界鲜有讨论。

古籍关于漕河的记载较多且详细,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龙门河”的文献是明末清初孔自来所著《江陵志余》,它将漕河和龙门河分开记载。“龙门河”条云:“自草市达于沙市,俗曰便河。堤杨垄麦,远近异观。当其盛时,箫鼓之声,昼夜靡歇。”^{[1](P131)}之后乾隆朝《荆州府志》“漕河”条记载提及龙门河:“在城北。自安陆府荆门州流入,至城东北,名草市河。至东南沙市,名沙市河,亦名龙门河,俗名便河。……后诸口多淤塞,今漕河上流仅自纪山通草市,名太晖港。与大漕河不相通矣。”^{[2](P75~76)}此段涉及到便河的记载依然是从草市到沙市河段,只是对其上流漕河的变化予以说明,即“今漕河上流仅自纪山通草市,名太晖港。与大漕河不相通矣”,对下游便河的

记载不甚了了。光绪朝沙市人王百川著《沙市志略》“龙门河”条记载:“水自草市引长湖关沮口之源,以济舟楫,赴襄汉之便,兼以蓄泄城河。惟近来疏浚不力,以致水涨则泛滥,稍旱则底见龟坼。”^{[3](P41)}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沙市便河属于漕河的一段,指的是从草市河到沙市河段。该河始凿于何时?黄盛璋《江汉运河考》^{[4](P87)}一文,在汇集有关材料和各家说法的基础上,对“大漕河”和“漕河”进行了考证,认为“漕河上游太晖港水可以肯定就是高氏父子所开”(注:文中“高氏父子”即五代高季兴、高从海父子),“至于此河下游自城东至沙市一段,记载不如西段明确,……我们推测当为高氏父子所开”,此说法可信。文章结尾又进一步指出:“清两《一统志》以为宋元嘉所通即城东下漕河,其意仍指沙市河而言,这个理解不是很正确,因为沙市最早出现于唐代记载中,倘六朝已有,《水经注》不应遗漏,刘宋时或尚无聚落,至少并非要镇,无缘要开一条运河至此。”^{[4](P87)}此说不甚明了。因为从草市河往东有二处河口与便河相通,一处从草市河(太晖港)流出,经城东漕河向东南流向沙市,称荆沙河;一处在雷家垱

收稿日期:2020-10-20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荆州水灾与洪水文化研究”(17D030)

作者简介:李义芳(1967—),女,湖北潜江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荆楚文化研究。

附近,分漕河水南流,称便河。此二条支流在沙市西白云桥附近相汇成一条河流,绕沙市城由北向南流入城中心。整个河段统称便河。作者没有明确说明高氏父子所开运河是荆沙河,更没交代分漕河水入沙市城之便河是何时所开。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南北向便河开凿时间、南平国开凿荆沙河的动机以及便河开凿与沙市城镇形成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开凿便河之缘起

前引黄盛璋先生《江汉运河考》一文,确认从草市到沙市的运河开凿于五代高氏父子统治荆州时期,也给出了诸多理由,但有些观点仍值得商榷。

首先,唐以前沙市是否属于要镇,沙市与草市之间是否有必要开凿人工运河?

草市是江陵城外的集市,它的兴起与江陵城的修筑及政治军事地位的提高和人口增加密切相关。江陵城始建于汉临江王荣,关羽增筑之。但此时的江陵城是土城,直到梁元帝时才“栅江陵城,楼雉相望,周回七十余里”^{[1](P161)}。梁以前的城市安全,一是靠江堤,二是靠设关把守。城西有沮漳河,城南有江水,这是天然屏障,但江水泛滥会给城市带来灾难,因此,修筑江堤便十分必要。东晋荆州刺史桓温部下陈遵修筑了金堤。金堤自江陵城西南,向东延伸经城南而到达城东南约3里处^{[5](P70~71)},既能防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御敌。城北有灵溪、龙陂河流经,且有堤防。城东的地形比较复杂,它曾经是古云梦泽的西端,也是荆江陆上三角洲的顶端。在科氏力和地质构造运动向南掀斜的长期作用下,荆江主泓不断南移,与此同时云梦泽也不断向东南方向收缩,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河湖交错分布的地形。因此在东门外设关保障江陵城的安全就很有必要。

草市还是江陵城的东关。《江陵志余》载:“草市,古东关也。有桥曰东市,漕水回环,亦商贾凑集之地。”^{[1](P172)} 乾隆《荆州府志》记:“草市在城东四里。东连漕河,南通沙市,舟楫往来,居民辐轴。有岳山坝。……有东关。今东关垻尚沿其名。”^{[2](P636)} 可见,起初草市是江陵城东门外的一道关门。虽然不能确知草市在何时成为江陵城的东关,但从江陵城的修筑时间可略知一二。江陵城由楚渚宫发展而来,“汉临江王荣始建城,关壮缪增筑之”^{[1](P172)}。虽然关羽增筑的也是土城,但有城就应该有了城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江陵城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任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对江陵城的守卫。草市有沙桥(历

代方志都有记载),历史上曾经是古战场。《通鉴》曰:“晋义熙元年,桓振自郢城袭江陵,建威将军刘怀肃自云杜引兵驰赴,与振战于沙桥。”^{[6](P1555)} 南朝宋元嘉三年,“雍州刺史刘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济与台军主沈敞之袭江陵,至沙桥,周超大破之”^{[7](P301)}。“升明二年,沈攸之举兵东下,张敬儿为雍州刺史,乘虚袭江陵,至沙桥,城中自相惊溃。敬儿遂入江陵。”^{[8](P2774)} 可见,草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成为江陵城的东关,它直接关系到江陵城东边的安危。

沙市“在(江陵)县东南十五里,一名沙津,一名沙头。《宋史·司马梦求》:沙市距城十五里,南阻蜀江,北倚江陵,地势险固”^{[9](P106)}。在东汉时期,政府在此始设津乡行政单位管理。《后汉书》记载:“江陵有津乡。”《左传》庄公十九年记楚国军队“大败于津”。杜预注曰:“楚地,或曰江陵县有津乡。”《光武纪》:“建武五年,岑彭伐公孙述,自引兵还屯津乡,当荆州要会。”^{[10](P217)} 津乡,李贤注曰:“县名,所谓江津也。”又引《东观纪》曰:“津乡当荆、扬之咽喉。”《荆州记》:“江陵县东三里有津乡。”^{[11](P223)} 历史上津乡有二处:一在枝江县西,即王百川引郡杂记云“上津乡”;一在江陵县,“盖即今之沙头”。^{[3](P2)}

魏晋南北朝时期,沙市域内有奉城、江津、江津戍、江津口和豫章口等著名军事要地。《水经注》“江水”篇云:

(燕尾)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长所治。……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对马头岸……北对大岸,谓之江津口……江大自此始也。《家语》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风,不可涉也。故郭景纯云:“济江津以起涨”。言其深广也。江水又东迳郢城南,子囊遗言所筑城也。《地理志》曰:楚别邑,故郢矣。……江水又东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12](P2864)}

奉城和江津在江心的燕尾洲上,南对马头岸,北对大岸,洲与北面的大岸之间有一道沱水,其出口在东面与江水主泓道会合处,称为江津口。再往东有豫章口,为夏水分江口。盛弘之《荆州记》曰:“江津东十余里有中夏洲,洲之首,江之汜也。故屈原云:‘经夏首而西浮。’”从江津口至豫章口之间的陆洲为中夏洲。张修桂认为,中夏洲即为古之沙市地,今沙市是在古代中夏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3](P54)} 这一带曾经是重要渡口和军事要塞,历史上多次战役发生于此。《晋书》云:“王镇恶以百舸袭刘毅至豫章口,去江陵二十里,舍船步上,穴城而入。”晋义熙元年(405),“刘毅击破桓振党冯该于豫章口。八年,刘

裕遣王镇恶袭刘毅于江陵,至豫章口,去城二十里,舍舟步上,是也”^{[8](P2770)}。因为从江津口至豫章口之间江面开阔,“非方舟避风,不可涉也”,而东至豫章口处江水分流成夏水,豫章口便成为一个重要港口。此时沙市虽然没有筑城,但因战略地位重要,故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到了唐代,燕尾洲逐渐靠岸,过去洲上之奉城和中夏洲连成一片,北岸江津口向东偏南方向移动,成为荆江重要渡口,称之为津巷子,沙市便在此形成。明代雷思霈《荆州方輿书》记载:“江水径御路口,东播于沙市津巷子,即古江津口。”孔自来也持此观点:“江水自此益大,一曰大岸,今沙头津巷子是。”^{[1](P111)}其《江津怀古》诗云:“江津之水何弥弥,惊涛远接中流砥。吴舸蜀艇候好风,椎牛酹酒沙头市。江渚庙前花乱红,行人指点章台宫。”^{[1](P111)}诗中“中流砥”“江渚庙”“章台宫”均离江津口不远,其中“江渚庙”离江津口最近。此时古豫章口和中夏口河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被淤塞,夏水也不再是沙市河段的分流水道,它已成为独立水道。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沙市虽然没有形成市镇(在唐代才初步形成),但已成为重要的渡口和军事要地,所以就有必要开辟连接长江边军事重镇豫章口或江津口至草市的漕运。

其次,《水经注》真没有记载沙市与江陵城之间的水上通道吗?

答案是否定的。《水经注》“沔水”篇曰:

陂水又迳郢城南,东北流谓之杨水。又东北,路白湖水注之。湖在大港北,港南曰中湖,南堤下曰昏官湖,三湖合为一水,东通荒谷,……春夏水盛,则南通大江,否则南迳江堤,北迳方城西。……又北与三湖会……宋元嘉中,通路白湖,下注杨水,以广运漕。杨水又东历天井北,……。西岸有天井台,因基旧堤,临际水湄,游憩之佳处也。^{[12](P2406)}

杨水经过郢城南,之后向东北流经荒谷水,由荒谷水连接大江,只是没有说明荒谷水的位置及其流向。因此,后人有各种说法。文中“南迳江堤”即东晋陈遵修筑之“金堤”,为了发挥金堤护城的作用,向东延伸至此。荒谷水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水位低时被江堤所阻而“南迳江堤”,水位高时即可顺堤向下至无堤处入江而“南通大江”。^{[14](P128)}还有人认为连接荒谷水和大江的应该是“一条人工水道,中间还有堤岸相隔,颇疑杜预开凿运河时,就已在这里引江水入于扬水。引入江水,固然需要开辟一条新的水道,却

也是为了补充扬水的水源”^{[15](P125)}。鲁西奇等人认为:“荒谷水与江水相连之口,当即西晋时杜预所开杨口运河的南口,亦有‘杨口’之称。”^{[16](P106)}荒谷水与江水相通无疑,问题是荒谷水流经及入江之处何在。

先弄清楚引文中几个地名。一是三湖。文中有2处提到三湖,前面的三湖是指路白湖、中湖和昏官湖,离城3里余,此三湖在东面合为一水,即荒谷水。《后汉书·郡国志·南郡》条下有注文:《荆州记》:“(江陵)县东三里余有三湖,湖东有水,名茺谷。”^{[11](P223)}“茺谷”为荒谷之误。^{[12](P2406)}“又北与三湖会”中的“三湖”是指位于江陵县东北八十里的三湖(没有列举三湖名称)。二是方城。《水经注》云:杨水“又东历天井北,井在方城北里余,广圆二里,其深不测,……。西岸有天井台,因基旧堤,临际水湄,游憩之佳处也”。酈道元注“方城”是“南蛮府也”,并引盛弘之语:“南蛮府东有三湖,源同一水,盖徙治西府也”。南蛮府即江陵府,此处当指江陵城。根据江陵城东的三湖和方城的位置,大致可以判断荒谷水离江陵城东3里左右。荒谷水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水小则有江堤阻拦,水盛则“南通大江”。结合雷思霈“草市之漕水间,亦溯流达于白云桥”的记载,可知漕河在三湖处确有一条到达沙市的河流,正好属于便河的一条分支。

荒谷水在何处通江?根据古江陵县地势东南倾的特点,荒谷水应该向东南流入江,但如果加上人为因素,即可南流入江,所以史念海先生认为连接荒谷水和江水的可能是杜预所开的人工运河。鲁西奇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荒谷水入江水之口是“杜预所开杨口运河的南口”,“江水盛涨时溢入荒谷水,复入三湖”。此说是否可信?据光绪《荆州府志》记载,江陵城东5里有菩提寺,“唐建,依古大堤。堤为节度使段文昌所修,又曰段堤寺”^{[9](P750)}。民国《湖北通志》沿用此说法:“菩提寺,在县东五里,唐建,依古大堤。堤为节度使段文昌所修,又曰段堤寺。荆寺虽广,而此刹较称净僻。”虽然堤和寺是唐代所建,但远古时代东门外分布着东西向的5条自然堤,其中“从码银街沿唐代江堤的自然堤与江堤相接”^{[17](P123)},唐堤就是在自然堤基础上修筑的。根据菩提寺的地理位置可以推测,在荒谷水南边有江堤。此前江陵城南江中之洲逐渐靠岸,江水逐渐南移,为修筑江堤创造条件。唐末至南宋以后“段”讹为“断”,段堤寺或为宋人所谓“断堤寺”。此堤和金堤一样,也是为了防止江水对江陵城的侵蚀而建。^{[18](P161)}虽然段堤的走向无从考证,但唐代江陵城

东的地形能够提供大致的思路。在城南3里有南湖,“唐郑审谪在江陵,构亭湖上。杜甫寄诗云:‘东郡时题壁,南湖日扣舷。’又云:‘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为觅郑瓜州。’或作‘南淮’,元微之贬江陵士曹掾,有《南淮泛舟攀月》诗”^{[1](P129)}。南湖即古江水之分岔处,即《水经注》所记之“江津口”,因为“江大自此始”,所以会发生江水溢入荒谷水进而回流至三湖的现象。因此,杜预所开杨口运河经荒谷水在“古江津口”处入江。

《水经注》所记“荒谷水”即为便河之前身,早在水经注时代即有了。黄盛璋先生所证从荆州城东至沙市之便河(荆沙河段)是高氏父子所筑之说可信,见图1。

图1 荒谷水流向示意图^①

二、高氏政权凿便河之原因

前述早在水经注时代就有荒谷水连接漕河和沙市,为什么高氏父子要另开一条荆沙河呢?

首先是荆江主泓南移,距离荆州城十余里,沙市作为荆州外港离城更远,原有航道不能到达。

古代沙市域内人类活动范围是从北向南逐步移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云梦泽萎缩和江水南移,今沙市长港路从福利院经蛇入山到日光灯厂一线已经得到开发,人口比较密集。因此,西晋杜预攻克江陵后,在江津置江津戍,筑奉城,设江津长,领百家,主度江南诸州贡奉,并“徙将土屯戍之家以实江北”,

开凿沟通长江与汉水的漕河。东晋“王处仲为荆州刺史,凿漕河通江汉北埭”,即疏浚漕河。由于战争需要,修筑司马休之垒、鲁宗之垒,为城市和堤防建设打下基础。此时江陵城才开始营建,江水从城南流过,沙市称津乡或江津,位于江中沙洲之上。酈道元所记江津、江津口和豫章口均位于沙洲之上。荒谷水所通之江为江水之北沱。

据地质学家研究,到唐宋时代,“荆江三角洲的地面高程,已增至一定值,从而使荆江左岸分流发生质的变化。原先荆江左岸的一些常年性分流,已告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季节性的自然分洪穴口”^{[19](P105)}。原荒谷水所通之江水北沱河床萎缩,江中沙洲逐渐靠岸,只是其西北、东南开始出现众多的湖泊,比如江陵城东的南湖、北湖,以及东西向的内河张家港、长夏港和椒茨渊等。同时南江河道也明显南移,已远离江陵城南十余里之遥。因为江面变窄,河床自然淤升,江陵地区洪水频率提高,加速了堤防的发展,城东南面的江埠渡口沙头依堤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市镇,于是就出现了唐代诗人描写的沙市以堤为市的场景:“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头压大堤。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此时的江堤西接金堤,经赶马台,过龙堂寺,向东延伸。^{[17](P278)}原来位于江州之上的江津口和豫章口均已靠岸,江水主泓南移。

因此,地理环境的变迁,原有运河不能抵达沙头市镇区,这是南平国统治者续挖便河的客观原因。

其次,江陵城对南平国的政治军事意义,迅速增加的城区人口,以及沙市作为江陵城外港和贸易市镇的战略地位迅速提高,是南平国开凿运河的内部动因。

唐朝末年,寇乱相继,“荆南节度十州,当唐之末,为诸道所侵,季兴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后,井邑凋零”^②。后梁开平元年,高季兴到任荆南节度使之后,“招缉绥抚,人士归之,乃以倪可福、鲍唐为将帅,梁震、司空熏、王保义等为宾客。太祖崩,季兴见梁日以衰弱,乃谋阻兵自固,治城隍,设楼橹”^③,开始修筑江陵内城外垒,积蓄实力,俟机扩张。乾化二年,“季昌(即季兴)潜有据荆南之志,乃治城堞,设楼橹,奏筑江陵外城,……,复建楚雄楼、

① 参见杨守敬等《水经注图(外二种)》,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09页。

②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九·南平世家第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

望江楼为捍敌。执畚鍤者十数万人,将校宾友皆负土相助。郭外五十里冢墓多发掘,取砖以甃城”^{[20](P184)}。“(后梁)龙德元年,季兴遣都指挥使倪可福督修外郭。自巡城,责功程之慢,杖之。后唐天成二年,又筑内城以自固。”^{[9](P240)}除了修外城,还在城内修亭台楼榭,“季兴先时建渚宫于府庭西北隅,延袤十余里,亭榭鳞次,艘舰翼张,栽种异果名花修竹。从海绍立,尤加完葺”^{[21](P4110)}。同光三年,后唐封高季兴为南平王,从此他的政权就以南平(荆南)为正式称号。

高氏政权地狭兵弱,在诸多割据政权中处于劣势。为求生存,高季兴和他的后人推行“赖子”外交政策。“自吴称帝,而南汉、闽、楚皆奉梁正朔,岁时贡奉,皆假道荆南。季兴、从海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诸道以书责诘,或发兵加讨,即复还之而无愧。其后南汉与闽、蜀皆称帝,从海所向称臣,盖利其赐予。”^{[22](P567)}“高赖子”虽是贬义,但也有人赞之为务实,“蕞尔荆南,处四战之地,惟修好邻邦,不失事大之礼,庶免于难。故苟可以保境安民,虽悉索敝赋,屈事强邻畏天者犹或为之,况诸国妄自尊大,迭相雄长,各帝一方。竟以实利博虚名,其能贵于高无赖者,曾几何哉”^{[23](P93)}。“赖子”政策的施行必然仰赖于水上交通,要维护高氏政权的稳定和江陵城的安全,就必须加强与沙市的联系,因此开凿运河实属必要。唐中期以后,沙市除了沿堤市集兴起外,地域内人口增加,农业生产迅速提高,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①随着北民南迁,江陵经济得到开发。“贞元八年,节度使嗣曹王皋塞古堤,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又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②沙市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使其成为高氏政权的重要赋税来源地。

三、便河开凿与沙市市镇的形成

便河是漕河的支流,便河的开凿使沙市和荆州城的交通更为便利,沙市与汉江的联系得以建立。在便河开凿之后,沙市依托堤防修建城垣和城濠,形成以城区为中心、以水路交通为网络的典型市镇。

东晋陈遵所造金堤从江陵城南向东延伸3里,荒谷水曾从其东段向南流入长江。唐代沙市地域有段堤,堤为节度使段文昌所修,堤旁有寺,名段堤寺。对该堤位置和走向,根据考古资料和本地学者研究,大致在赶马台至龙堂寺一带。因为这时长江南移,这里濒临长江,因此有修堤的必要。^[24]五代高氏政权、北宋郑獬^③、南宋张孝祥都曾增筑沙市堤防,防御江患。虽然学界对沙市堤防始筑时间和名称看法不一,但一般认为宋代沙市堤防很完整,从赶马台、青石板、江渚观到红门楼,形成一条完整的堤防线。随着长江堤防的修筑,堤内的水域逐渐缩小,陆地面积扩大,人口逐渐密集,过去的津乡逐渐发展为镇。到了宋代,已形成了以便河为护城河的沙市城区。陆游《入蜀记》载,江渚庙在“沙市之东三四里”,新河口(沮水入江口)“距沙市三四里,盖蜀人修船处”^{[24](P105)},从中可以大致判断沙市城的范围,便河成为沙市城北、东、东南的护城河,江堤为南城墙。便河既能保证沙市镇区的安全,又是南北航运的重要通道。宋代时沙市的商业贸易额甚至超过了江陵城,熙宁十年(1077),沙市务的年商税额为“九千八百一贯六十五文,居江陵府属22个榷场(务)之首”,这标志着江陵府的经济中心在空间上发生了转移,由江陵城转向了沙市。乾道(1165~1173)以后,沙市“四方之商贾辐凑,舟车骈集”,“居民栉比”,人口超过万余。陆游所见“沙头巷陌三千家”,与《宋史·五行志》有关“淳熙六年(1179)江陵沙市火,燔民居数千家,延及江船,焚溺无算”的记载相符合,说明此时的沙市已是万人以上的城市。^{[25](P175)}

沙市的稳定繁荣在元兵到来时遭到破坏,“蒙古屠沙市,江陵遂陷”^{[8](P2768)}。元兵攻占江陵后,设中兴路,辖“录事司一,县七”,录事司和江陵县治所均在沙市。至元癸巳,建中兴县学,大德中在便河西望江亭之西建城隍庙,泰定初年在江渚观东北豫章台上建章台寺,使沙市镇成为一个县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建有四个城门:塔儿(东)、大寨(南)(元代增筑)、新开(西)、美化(北)。明清时期,沙市城区和街巷有了进一步扩展,便河连接着城内外渊塘湖泊,既是主要的对外交通要道,也是推动沙市商业贸易

① 见刘昫《旧唐书卷三十九·志第十九·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见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十·志第三十·地理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宋史·志第五十·河渠七》:庆元三年,臣僚言:“江陵府去城十余里,有沙市镇,据水陆之冲,熙宁中,郑獬作守,始筑长堤捍水。缘地本沙渚,当蜀江下流,每遇涨潦奔冲,沙水相荡,摧圯动辄数十丈,见存民屋,岌岌危惧。乞下江陵府同驻扎副都统制司发卒修筑,庶几远民安堵,免被垫溺。”从之。

和旅游服务业发展的通道。明末清初吴江人计东的《明季北略》称:“天下重镇,其一如荆州之沙市,自唐、宋已极盛。”^{[3](P4)}为加强对沙市交通和赋税的管理,明政府在沙市设荆南行馆、荆南水驿、税课司、荆南递运所、工部抽分厂^{[26](P164)}等机构。

便河除了具有交通运输功能外,还是一条旅游线路。明清时期便河沿岸有龙门桥、望江亭和城隍庙、塔儿桥等著名景点,有大量文人墨客吟咏便河的诗文流传后世,其中也不乏反映便河沿岸商客云集、休闲娱乐的作品。袁中道《游便河》诗:“十里浓荫路,残莺佐酒卮。过桥添柳色,近岸损花枝。颇恨舟行急,偏嫌月上迟。天皇兰若在,批草觅遗碑。”^{[3](P42)}《游居柿录》有对该诗的进一步说明:“游便河,自天皇寺窑头发舟,过沙桥门,两岸垂柳覆渠。可十余里,至塔桥舍舟登遨游冢,至刘园,……。晚,复登舟还。”^{[27](P1331)}望江亭位于便河西边,是沙市的标志性建筑物,站在此处既可以远眺长江,也可以近观便河,反映清代沙市人口多、商业繁荣。“峥嵘楼阁景难描,画舫轻车引兴豪。三月游人多似蚁,春光装点便河桥。”这首诗说明来便河游玩的人非常多,带动了沙市的经济发展。“茶摊命棹西洋镜,顽意多般集便河。真是赏心闲散处,戏场各庙聚人多。”^{[28](P2652)}这说明便河还是一个商品云集、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到了近代,随着沙市开埠通商,长江航运功能大大提升,便河成为小型船只的运输通道。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对湖北省内河湖进行整改,兴修四湖总干渠,便河航运使命终结。

参考文献:

- [1]孔自来. 江陵志余[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 [2]叶仰高. 荆州府志[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 [3]王百川. 沙市志略校注[M]. 沙市:沙市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内部发行),1986.
- [4]黄盛璋. 江汉运河考[A].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 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C].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
- [5]程鹏举. 古代荆江北岸堤防堤防考辨[A].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第八辑)[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6]段木干. 中外地名大辞典[M]. 台湾:人文出版社,1981.
- [7]李延寿. 南史[M]. 长沙:岳麓书社,1998.
- [8]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香港:天下出版社,2000.
- [9]倪文蔚,顾嘉衡,等. 荆州府志[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 [10]钱林书. 续汉书郡国志汇释[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 [11]刘纬毅. 汉唐方志辑佚[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 [12]杨守敬,熊会贞. 水经注疏[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 [13]张修桂. 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三峡工程背景研究之一[A]. 复旦大学中国地理历史研究所. 历史地理研究(2)[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 [14]程鹏举. 荆江大堤形成期的讨论[A].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 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水利史研究文集[C].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6.
- [15]史念海. 中国的运河[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 [16]鲁西奇,潘晟. 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 [17]沙市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沙市市志[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 [18]杨果. 宋辽金史论稿[M]. 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
- [19]杨怀仁,唐日长. 长江中游荆江变迁研究[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
- [20]郑学檬. 五代十国史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21]陈尚君.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11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22]魏收. 二十四史[M]. 上海:中华书局,1923.
- [23]王心湛. 五代诗话[M]. 上海:广益书局,1936.
- [24]袁纯富,范志谦. 从出土文物看古沙市位置的变迁[J]. 江汉考古,1984(3).
- [25]杨果. 宋代的沙头市与南草市——江汉平原城镇的个案分析[A]. 漆侠,王天顺. 宋史研究论文集[C].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
- [26]孙存. 荆州府志[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 [27]袁中道. 珂雪斋集(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8]雷梦水,等. 中华竹枝词[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